

王宏志 著

翻译与中国 近代

Translation and
Modern China

翻译与近代中国

王宏志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译与近代中国/王宏志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6
(中国当代翻译研究文库)
ISBN 978-7-309-10545-2

I. 翻… II. 王… III. 翻译-语言学史-研究-中国-近代 IV. H159-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68305 号

翻译与近代中国

王宏志 著
责任编辑/余璐瑶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960 1/16 印张 21 字数 259 千
2014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0545-2/H · 2316
定价:49.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当代翻译研究文库”总序

中国的翻译研究可谓源远流长,历史上长达千年的佛经翻译不仅造就了一批优秀的佛经翻译家,同时也催生了我国古代的翻译研究和相应的翻译思想。这些翻译思想,从三国时支谦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到东晋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从六朝鸠摩罗什的“依实出华”,到唐代玄奘的“五不翻”,尽管多属片言只语,零篇残什,但其中蕴含着的丰富的翻译思想弥足珍贵,仍然可以为当今的译学建设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源。像唐代贾公彦关于翻译的定义“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即使从今天的译学高度看,也堪称经典。

自从严复于 1898 年提出了“信达雅”三字以后,这三个字对我国的翻译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差不多长达大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我们的翻译研究,或是讨论怎样翻译才能做到“信达雅”,或是以“信达雅”三字为标准去评判已有的翻译作品,或是探讨“信达雅”的内涵和外延,等等,几乎到了言必称“信达雅”的地步。至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虽然傅雷提出了“神似”说,钱锺书提出了“化境”说,但其思想实质,严格而言,与“信达雅”说其实并无二致,孜孜以求的也就是要解决一个“怎么译”的问题。然而与此同时,同样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西方译学界却发生了一场根本性的变化:以奈达、纽马克、卡特福德为代表的一群学者站在语言学立场上,运用语言学的相关理论视角切入翻译研究,提出了“功能对等”、“交际翻译”、“语义翻译”等概念,刷新了两千年来的西方翻译研究的面貌,实现了西方翻译研究的第一个根本性的突破。

与西方相比,中国当代翻译研究的根本性转变,也即从传统译

论进入现代译论,具体而言,也即从仅仅关注“怎么译”的问题拓展到还要关注“何为译”、“译为何”等问题,时间上要晚一些,其起点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其时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我国外语院系的师生和专家学者第一次有机会走出国门,赴美英等西方国家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深入访问、进修学习,其中对翻译研究感兴趣的专家学者首先接触到了以奈达为代表的西方翻译研究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并在国内的学术期刊、大学学报上撰文评说,把他们了解到的信息传递给国内同行。这些文章部分结集成《外国翻译理论评介文集》^①于1983年出版,并与翌年编译出版的《奈达论翻译》^②一起,第一次比较多地介绍了外国、主要是西方以及苏联的当代翻译理论,从而为国内的翻译研究吹进了一股新风。之后,随着《外国翻译理论研究丛书》^③、《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④、《翻译与后现代性》^⑤、《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⑥等编译著述的出版,更进一步推动并扩大了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与此同时,从21世纪初开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这南北两家外语出版社先后分别引进了数十种当代国外翻译理论著作的英文原版本,让中国读者可以直接面对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英文原著,其产生的影响同样不能小觑。

①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选编《外国翻译理论评介文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3年。

② 谭载喜《奈达论翻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年。

③ 许钧主编《外国翻译理论研究丛书》,共收入四本,分别为《当代美国翻译理论》(郭建中编著)、《苏联翻译理论》(蔡毅、段京华编著)、《当代法国翻译理论》(许钧等编著)、《当代英国翻译理论》(廖七一编著),湖北教育出版社,分别于2000年、2001年出版。

④ 廖七一编著《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译林出版社,2000年。

⑤ 陈永国主编《翻译与后现代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⑥ 谢天振主编《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共收入八大译学流派33篇译学论文译文,均配以导读文章,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当代的翻译研究也开始发生变化,并朝着实现其根本性转变的方向而发展。这种变化首先体现在翻译学学科意识的觉醒上。在此之前,尽管中国的翻译活动也称得上丰富多样,译者和译作的数量更是堪称世界之最,中国的高等院校里也都开设了翻译课程,但相当多的人包括高校的一些教师和学生对于翻译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却不甚了了。不少人依然错误地认为,翻译不过就是把别人的东西从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实践性技能,缺乏自身的原创性,不可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他们看不到原本在一个有限的语言环境中产生有限影响的“原创性”著述通过翻译在另一个语境里得到的更大的传播和接受,甚至产生的更巨大的影响。他们更看不到最近几十年来,翻译本身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越来越得到来自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视角的关注和考察。翻译研究借助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阐释学、女性主义以及文化研究等领域的新理论和新方法,已经突破了语言中心主义的狭隘模式,而成为广义的文化研究平台下的一个分支学科领域。翻译研究也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哲学家、语言学家、文学理论家和文化研究学者,甚至包括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的关注目光。翻译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成为当今国际学界的共识。与之相应,在中国经历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关于翻译学的大讨论后,终于在21世纪之初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经得到了体制内的承认:目前已有159所高校建立了翻译硕士专业(MTI),另有一百余所高校建立了独立的本科层面的翻译系。此外,多所高校还都招收翻译学的博士生。

其次,体现在翻译研究理论意识的觉醒和跨文化研究视角的应用上。在中国,自清末民初以来的翻译研究多围绕文学翻译展开,而在文学翻译界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是:翻译是一门艺术,或者说是一种具有再创造性质的艺术,于是翻译理论也就被定位在建基于这样一种艺术实践中获取的经验之上,并反过来要求其能够指导翻译实践。由于这个原因,中国自近代以来的翻译研究,大

多是围绕着翻译实践展开的一些经验体会,并无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可言。但是随着翻译学这门学科在最近几十年来的日臻成熟,当今的翻译研究开始越来越多地跳出原先局限于语言文字转换框架内的“术”的层面,而越来越多地上升到关于翻译的思想和原则的“学”的层面。这样的翻译研究成果往往能够改变人们对某种既定的翻译行为、标准、方法等的看法,导致一种新的翻译实践模式的诞生。不难想见,在当今这个全球化时代,翻译必将继续占据人类知识领域的重要位置,并在未来的岁月里继续发挥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因此,传统的居于对比语言学之下的翻译的定义应当根据翻译的最新发展进行修正和完善,翻译的内涵应该进一步扩大,要把翻译从纯粹字面意义的转述定义为文化层面上翻译、阐释和交际。令人感到欣慰的是,中国学者的翻译研究成果,如谢天振的《译介学》^①、《隐身与现身——从传统译论到现代译论》^②,王宁的《文化翻译与经典阐释》^③、《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④,许钧的《翻译论》^⑤等著述所作的研究,正好契合了当今国际译学的最新发展趋向,并站在中国学者的独特立场,发出了中国学者的声音。

再次,体现在对翻译史研究和翻译批评研究的高度重视上。在此之前,中国几乎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史著作,对翻译史的研究同样少之又少。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在翻译文学史、翻译史的编撰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迄今为止,翻译史类的著述已经超过30部。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对翻译史的研究也取得

① 谢天振《译介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2013年译林出版社推出该书的增订本。

② 谢天振《隐身与现身——从传统译论到现代译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③ 王宁《文化翻译与经典阐释》,中华书局,2006年。

④ 王宁《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

⑤ 许钧《翻译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了长足的进展,王宏志的《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①、《翻译与文学之间》^②,廖七一《胡适诗歌翻译研究》^③、《中国近代翻译思想的嬗变》^④等,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与此同时,作为翻译学学科三大支柱之一的翻译批评同样得到了高度重视,许钧的《文学翻译批评研究》^⑤较早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最后,中国学者也没有遗忘翻译研究中的语言学视角,他们同样在这一领域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探索,并取得了不俗的成果,如黄国文的《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探索》^⑥和王东风的《连贯与翻译》^⑦等著述。

然而,尽管最近二三十年来我们在翻译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们的一些学者还在国际翻译研究或文学和文化研究刊物上主持过介绍中国翻译研究的专号^⑧,但是总的说来,由于语言文字的隔阂,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学者的译学研究成果并不是很了解。而由于传播的局限,甚至国内读者对于哪些学者和哪些著述能够代表中国翻译研究的前沿也不是很清楚。为此,我们决定编选一套翻译研究丛书“中国当代翻译研究文库”,集中展示中国当代翻译研究学者的代表性论著。我们将先推出“文库”的中文版,

① 王宏志《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

② 王宏志《翻译与文学之间》,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③ 廖七一:《胡适诗歌翻译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④ 廖七一:《中国近代翻译思想的嬗变》,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年。

⑤ 许钧《文学翻译批评研究》,译林出版社,1992年。

⑥ 黄国文《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探索》,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

⑦ 王东风《连贯与翻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年。

⑧ 如王宁为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 *Neohelicon*, *Amerasia Journ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等十多家国际英文期刊主编了翻译研究与文学和文化研究方面的专辑,许钧与王克非也为 *META* 主持过“中国翻译实践与理论”的专号,等等。这些专辑不仅发表了数十位中国学者研究翻译的论文,同时也加快了中国人文学科国际化的步伐。

然后推出它的英文版,在国外著名出版社出版。入选本“文库”的作者应该是能够代表当代中国翻译研究的前沿,其著述不仅在国内译学界处于领先地位,其中的一些论述也已经或者有可能引起国际学界关注,进而通过将来英文版在国际权威出版社的出版,使得中国的翻译研究进一步得到国际学界的了解和承认。在甄选“文库”的入选人选时,我们也有意考虑有不同学术背景、不同学科背景、不同外语语种的作者,尽量使入选的作者更具代表性。首批入选的六位作者既有比较文学学科背景,也有语言学背景;既有外国文学背景,还有中国文学背景。在外语语种方面,除英语外,还有俄语和法语背景的学者。入选的论文集原则上由作者本人从他已经公开发表的论文中精选出 15—20 篇的代表性论文,按内容编成三至四个部分,每本书的总字数控制在 20 万字左右。

“中国当代翻译研究文库”是一套开放性的丛书,第一辑入选的六位作者的论文集标题分别是:谢天振的《超越文本 超越翻译》,王宁的《比较文学、世界文学与翻译研究》,许钧的《从翻译出发:翻译和翻译研究》,王宏志的《翻译与近代中国》,廖七一的《翻译研究:从文本、语境到文化建构》,王东风的《跨学科的翻译研究》。在条件成熟时,我们还将陆续推出第二辑和第三辑。我们希望通过本“文库”的编选和出版(包括在国外权威出版社出版),不仅能为当代中国的翻译研究作出贡献,同时还能把能够代表中国译学研究前沿的专家学者及其代表性著述带入国际翻译研究界,让世界更直接、更快捷地了解中国的学术,让中国翻译界的学术研究切实有效地走出国门。

谢天振 王 宁
2014 年 2 月于上海

前言

一 从《一本〈晚清翻译史〉的构思》说起

2000年10月10—12日第三届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年会上,我作过一个题为《一本〈晚清翻译史〉的构思》的报告,经稍作整理后,这篇短文发表在2001年4月的《中国比较文学》上^①,距今已十多年了。不过,这部《晚清翻译史》始终还只是停留在“构思”的阶段,一直没有完成,更不要说正式出版,这是要向读者告罪的。但另一方面,这篇《构思》本身却似乎颇能引起注意,直至今天还经常见到不少文章在征引和借用,而且在书信以至当面的交流上也时有学者垂询。究其原因,大概有几点:一、那是较早提出一个跟一般翻译史书写结构不一样的理念;二、在讨论晚清翻译史书写结构时,该文指出了晚清翻译研究方面(当时)一些较新的角度;三、文中所提到的切入角度,有较大的“可用性”,除晚清翻译研究外,亦可应用于其他时期的翻译史研究。

2005年12月13日,我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作了一场讲座,题目叫《我的晚清翻译史》,讲述我怎样具体地去写这部翻译史。事实上,经过了几年的努力,这本晚清翻译史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形,甚至写成了十余万字,只是离开全书的完成还很远很远。

首先可以交代一下在构思上的改变。在最初的计划里,我是

^① 王宏志《一本〈晚清翻译史〉的构思》,《中国比较文学》第43期,2001年4月,第98—107页。

要写“一本”晚清翻译史的,尽管没有仔细去筹划过全书的篇幅或字数。不过,这计划在开始后不久便改变了,不但要写一本晚清翻译史,还要写出两本来。

就正如在《一本〈晚清翻译史〉的构思》所交代,原来准备写一部描述自19世纪下半叶开始至“五四”运动前夕的翻译史,所涉及的包括文学与非文学的翻译活动,当时准备以一个中心主题来把晚清所有的翻译活动贯串起来,就是翻译与政治的关系,因为无论是洋务运动中所推行的翻译活动,又或是严复翻译《天演论》《名学》《原富》等、梁启超倡议译印外国小说,以至周氏兄弟出版《域外小说集》,都包含了强烈的政治性,甚至可以说是政治主导的。因此,我当时是暂定了一个很普通的书名:《翻译与政治:晚清翻译史》,就是以翻译的政治动机来做串连,这看来是稳当的。不过,在开始撰写后不久便发现当中的问题,这不单是因为这样的书写所涵盖的范围太大,不好处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晚清非文学与文学翻译活动在性质、模式以至功能、影响等都迥然不同,要以相同的论述模式来涵盖是不合适的。即以赞助人为例,在非文学方面,无论是林则徐还是恭亲王,以至李鸿章、张之洞等,尽管他们的赞助力量和行为在具体细节方面存在差异,但作为赞助者最核心的元素却是一致的,那就是来自朝廷的政治权力,因此,这些非文学翻译活动的赞助者所代表的操控力量和模式其实是很接近的。但另一方面,虽然文学翻译也存在赞助人,但他们的背景、动机以至权力和表现模式,却是多元而复杂的,且更多时候是以经济作为操控的手段。要对他们进行描述,便不可能跟恭亲王等赞助人采用相同的模式。此外,文学翻译的研究对象:文学,自身具备了很多特质,包括各种各样文学的手段、文学格式等,是研究文学翻译时所不能忽略的,但这些却不可能包含在非文学翻译史论述的架构里。因此,有关晚清文学翻译的历史描述,便得要在另外一个论述架构里进行。在这情形下,我便决定把晚清翻

译史分成两本,以上、下编的形式出现:上编从鸦片战争开始,下迄甲午后严复翻译《天演论》为止,那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科技兴国篇”;下编是“专欲发表区区政见:文学救国篇”,从梁启超逃亡日本,倡议小说界革命,翻译政治小说开始。直到目前为止,手头上已写好的十余万字,都是属于上编的。书稿确是沿着原来的“构思”来书写,并不以编年史或资料史的方式进行描述,更不会排列一些基本的翻译史资料,如什么人什么时候翻译了什么等,而是以个别主题作为章节的脉络,论述晚清非文学翻译的几个重要课题。这是假定读者对晚清翻译活动有相当认识,无须再对一些基本史料作流水账式的陈列。

既然架构经已确定了,为什么不能把书稿完成?理由很简单,我们还没有充足的准备去完成一部所谓“专家史”的晚清翻译史^①,而当中的原因是我们对于翻译史里的绝大多数的个案还没有足够的理解。

应该承认,即使在今天,翻译史研究作为一门学术学科仍然是远远不够成熟的,甚至只能算是处于一个草创的阶段。一方面,有关翻译史书写的理论探讨并不太多,英文方面写得较早、最受人注意的是 Anthony Pym^②,但内容上不算得十分充实;中文方面,谢天振^③、王向远^④、邹振环^⑤等写过几篇扎实的讨论。此外,翻译史研究普遍有着一个文学性的倾向:今天有为数不少以翻译史为名的

① 参陈平原《20世纪中国小说史》第1卷(1897—191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② Anthony Pym, *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 Manchester: St Jerome, 1998.

③ 谢天振《中国翻译文学史:实践与理论》,《中国比较文学》1998年第2期,第1—19页。

④ 王向远《翻译文学史的理论与方法》,《中国比较文学》2000年第4期,第46—56页。

⑤ 邹振环《晚明至晚清的翻译:内部史与外部史》,《疏通知翻译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22页。

专著,占上最大比例的是文学翻译史。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很多翻译研究的学者都是文学训练的背景。

对于这些直到现时为止已出版的文学翻译史著,我们也许可以统称为第一代的中国文学翻译史著。毫无疑问,它们是有其特点、价值和贡献的。它们一个明显共通的特点就是在资料的整理和排列上,主要的内容是铺排了什么人在什么时候翻译和出版了什么作品,另外就是什么人说了一些什么有关翻译方法或理念的言论,而其中部分较详细的会对一些作品内容及基本特点稍作交代和分析。这样的翻译史是重要的,因为它们能够让读者知道一些主要翻译活动的概况,而且为将来作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基本的材料。然而,我们也必须承认,这样的文学翻译史还是不足够的,因为它们的书写模式仍有很大的局限性。第一,它只能交代翻译现象的表面状况,缺乏深入的分析,未能表现和解释这些翻译现象真正的功能和意义。因此,它们甚至有时候被视为史料汇编。第二,由于这些史著主要在罗列资料,不容易展现作者作为学术研究者的视野、功力和独特的见解。可以指出一个现象,很多翻译史的作者是以主编的形式出现的,这固然是因为这些翻译史不少都是集合很多人去集体编写,但更往往是因为它们主要展示资料的汇集和整理,因而更接近于编纂、整理,而不是研究论著。这不单减低了这些史著的学术价值,更严重的问题是:往下的翻译史应该怎样写?如果我们的翻译史只在于铺排什么人在什么时候翻译和出版什么作品,什么人说了一些什么有关翻译方法或理念的言论,那么我们便再也没有必要去写或出版新的翻译史了,因为这些基本资料都是一样的,前人已经把它们写过出来了。结果,新出的翻译史便跟前面已出版的不会有很大的分别,最后导致所有的翻译史都会非常相似,是一个又一个的复写、甚至相互抄袭的过程,那么,我们的翻译史著便再没有任何的学术价值和地位了。在这情形下,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有学者早就提出要

“重写翻译史”^①了。

但相比之下,非文学的翻译史方面却有另外的问题:很多基本的史料还不齐备,更不要说完整的翻译史专著了。当然也不是完全的空白。检视一下,科学翻译方面,成绩较突出的是黎难秋,他除了编有一本资料集外^②,亦有和李亚舒合作的《中国科学翻译史》^③,以及黎难秋自己的《中国科学文献翻译史稿》^④。宗教翻译,主要是佛经翻译,也有专门的译史,包括王铁钧的《中国佛典翻译史稿》^⑤,圣经翻译史方面,大都在香港出版,但都是篇幅短少的作品^⑥,内地迄今未见有一本圣经翻译史专著。不过,一些涉及汉族与周边地区民族以至国内少数民族的翻译史是很值得重视的,早在1994年便出版的《西域翻译史》,处理的是历史上汉族跟西域部族和国家交往时的翻译状况^⑦,而《新疆现代翻译史》^⑧、《藏族翻译史及历代译师传略明鉴》同样都是以少数民族翻译活动为主体的翻译史^⑨。另一方面,《西域翻译史》在某程度上可以说是外交翻译

① 孔慧怡《重写翻译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2005年。当然,我们明白这理念是受到1989年在上海出现的“重写文学史”运动的启发的。参王宏志《打破公论,挑战权威:论大陆1989年的“重写文学史”运动》,《文学与政治之间》,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4年,第287—354页。亦可参李陀编选:《昨天的故事:关于重写文学史》,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6年;杨庆祥《“重写”的限度“重写文学史”的想象和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② 黎难秋《中国科学翻译史料》,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③ 李亚舒、黎难秋等《中国科学翻译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黎难秋《中国科学翻译史》,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④ 黎难秋《中国科学文献翻译史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3年。

⑤ 王铁钧《中国佛典翻译史稿》,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裴源《佛经翻译史实研究:中国翻译史纲(上编)》,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83年。

⑥ 赵维本《译经溯源:现代五大中文圣经翻译史》,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1993年;中文圣经新译会《中文圣经翻译小史》,香港:天道书楼,1986年;陈少兰编著《中文圣经翻译简史》,香港:环球圣经公会有限公司,2005年。

⑦ 热扎克、买提尼牙孜主编《西域翻译史》,新疆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⑧ 陈世明《新疆现代翻译史》,新疆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⑨ 旺堆次仁《藏族翻译史及历代译师传略明鉴》,民族出版社,2001年。

史,性质接近的还有黎难秋的《中国口译史》,因为后者不少内容都是处理外交上的口译的^①;不过,一部较为正式的中国外交翻译史还是阙如的。

尽管有着这些开创性的著作,但还是远远不够的,原因在于非文学翻译涉及的范围更广,更为跨学科。如以晚清为例,非文学翻译可以包括兵工、造船、史地、法律、天文、算术、科学、教育,还有外交、经济、政治等不同范畴。显然,现在还没有一部晚清的非文学翻译史能够比较全面地涵盖各个不同的领域,连基本材料性的著作也还没有。

在这情形下,要去写一本论述性的晚清非文学翻译史,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足够的前人研究可供参考或借镜,而几乎每一个案都是从最原始的资料搜集开始。举例说,原来要写“翻译的机构”,我便首先着手去研究同文馆。相对来说,这是比较容易处理的,因为同文馆在历史研究上是有较多的成果的,主要的材料也比较齐全,只是一般不会把重点放在翻译上,因此,我较轻松地写出了一篇《京师同文馆与晚清翻译》的文章^②。不过,京师同文馆以外,上海广方言馆呢?江南制造局编译馆呢?广学会呢?现有的研究成果是否足够?

很明显,在现阶段要写出一部比较完整、且有深度的、专家式的晚清翻译史是不大可能的。现阶段急切要做的是大量的个案研究。没有足够坚实的个案研究的成果作基础,翻译史是写不出来的。就是这样,撰写一部《晚清翻译史》的计划便告终结了。

在过去的十余年里,个人比较偏重于一些具体的翻译史个案研究,同时也尝试去做点推动的工作。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自2011年开始每年出版一辑《翻译史研究》,专门刊登有关中国

① 黎难秋《中国口译史》,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② 王宏志《京师同文馆与晚清翻译事业》,《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03年第12期,第289—330页。

翻译史个案研究的文章,另外所主办的不少活动也把重点放在翻译史研究上,例如译学新芽研讨会以“书写中国翻译史”为主题,而译学暑期班也是要“阅读中国翻译史”。在这里,也许可以简单地讨论一下翻译史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

我们知道,今天的历史研究已走出了那种只谈一些重要政治人物和事件的大历史模式,文化史的(重新)兴起,让人们愿意去审视过去发生过的任何事情,使它们成为历史书写的对象。出现在过去的一些翻译活动,自然也是历史研究和书写的对象,这就是翻译史研究。我完全认同,翻译史研究是历史研究的一种,就跟经济史研究、法律史研究、出版史研究、新闻史研究、思想史研究,以至文学史研究等一样,都是历史研究的一种。不同的历史研究的重点和主体并不相同,应该由不同专业训练的学者负责,例如文学史多由文学研究者撰写,教育史研究往往由教育方面的专家来进行。简单而言,翻译史研究就是对各种各样涉及翻译的现象进行历史性的研究,作用是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些曾经出现过的翻译现象在特定的历史时空里出现时的真正意义。它既是历史研究,也是翻译研究,由翻译学者来进行研究是最合适不过的。当然,历史学者也是很能够在翻译史研究上作出贡献的:复旦大学历史系的邹振环、台湾“中研院”近史所的黄克武,以及日本关西大学的沈国威、成城大学的陈力卫等,都写了不少属于翻译史课题的文章和专著,极具学习和参考的价值;另外,概念史、文化史、宗教史、历史语言学等,也在很多方面跟翻译史研究有重叠的地方。

回到翻译现象的问题,它所包含是很广泛的,大多数人注意的大概是文本,就是译文,这当然是翻译史现象的一种,但译文以外,译者、赞助人、翻译理论、翻译出版、翻译审查、翻译作品的流播和影响、翻译法律,以至翻译、社会、文化、政治等方面在特定译入语时空的不同规范,都是可作研究的翻译史现象。而且,翻译史研究的范围可以涵盖很广,不应只局限于文学翻译,还可以包括科学翻译史的个案,以至宗教、政治、法律、教育、思想、经济等各方面。简

而言之,只要我们的翻译活动涉及了什么的范围,翻译史研究便应该注意当中有意义的个案。此外,一个很重要的理念是:翻译史研究无可避免的是一门跨学科的学科,不应囿于传统学科的界线或局限。这本来就是最明显不过的,单以研究文学翻译史个案为例,我们同时进行的是文学研究与翻译研究,这已是跨了两个学科了,但还不止于此,文学翻译往往跟当时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元素有密切的关系,那便更需要跨到别的学科去。

我所主张的翻译史研究方法和描述性论述模式,是接近于文化史方面的。在这方面,一位极为权威的学者是剑桥大学的彼得·伯克(Peter Burke),他有十数本研究欧洲中世纪以来的社会文化史巨著,而一部深入浅出的理论著作是《什么是文化史》^①,是一本很可以认真阅读的好书。值得注意的是,这位欧洲文化史专家近年开始了翻译研究,发表论文以外^②,还与历史学家夏伯嘉编辑出版一本有关欧洲近代前期的翻译文化专著^③。这正好说明了翻译史作为文化史的路向。

作为历史性描述的一种,翻译史研究最关键的一点是把个案放置回到历史的背景去(back to the historical context),也就是要注意该个案产生时候的历史背景。即使是对作品作描述性研究,尽管我们往往会对原文和译文,找出两者相同或相异的地方,然而,这些都只不过是表面和明显的现象,几乎任何读者都能轻易看出来,如果没有回到历史的背景,我们便不能解释为什么原文和

① Peter Burke, *What is Cultural History?* Cambridge & Malden: Polity Press, 2004; 中译本见:彼得·伯克《什么是文化史》,蔡玉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② Peter Burke, "The Renaissance Translator as Go-Between," in Andreas Höfele & Werner von Koppenfels eds., *Renaissance Go-Betweens: Cultural Exchang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2005, pp. 17-31.

③ Peter Burke & R. Po-chia Hsia eds., *Cultural Transla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